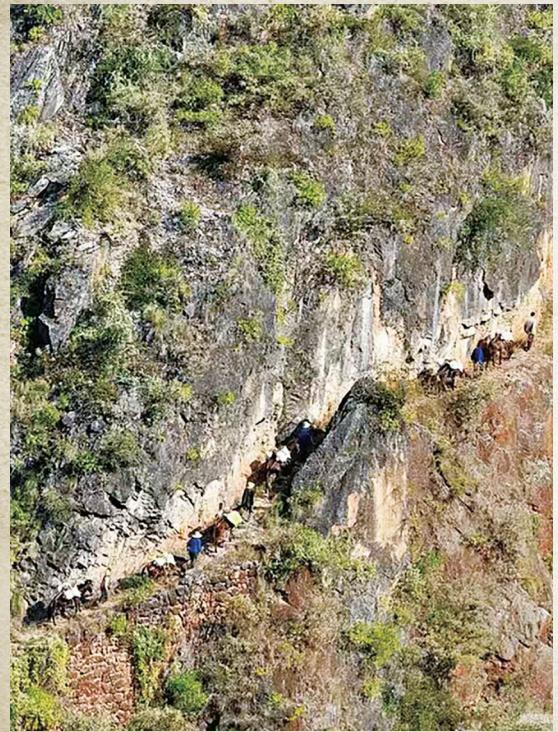


大型历史人文纪实报道
昆滇风雲人物传
大事记
大工程
地方志

中华民族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。云岭大地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云南人民勤劳勇敢，善良淳朴，为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增添了光彩的一笔。千百年来，云南人民敢为人先，为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以及国家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云南考察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。云南广大干部群众在省委、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，奋进新征程，建功新时代，努力推动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。温故而知新，重温惊心动魄的大事件，比学可亲可敬的老前辈，凝望泽被后世的大工程，展现丰富多彩的风物志……对于鼓舞斗志，努力把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为此，本报推出大型人文历史纪实报道“昆滇风雲”，以读者的视角解读昆滇人文历史，并请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书法家杜建民先生题写了刊头。同时，我们诚邀广大读者积极参与，提供报道线索，请拨打本报热线(0871)64100000，投稿请发电子邮件ccwbwq@163.com并注明“昆滇风雲”字样。

清朝乾隆年间开始，云南每年运铜至京
所经陆路2200余里、水路8200余里

关山万里运京铜

石门坎小田坝村山崖上的运铜古道 会泽县文联供图



会泽公园广场中央矗立着一个高达二十多米的大铜钱 汤东波 摄

纯铜建造的金殿 本报记者 苏颖 摄
会泽县文管所收藏的宝云铸钱局铜铤 会泽县文联供图

今年1月，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、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《云南省“十四五”城乡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》，制定了全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“十四五”发展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，在加强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中，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滇铜京运等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保护，扎实推进集中连片保护发展试点示范工作。

滇铜京运，史称“南铜北运”，始于清雍正五年(1727年)，终于宣统三年(1911年)，前后历时185年，是关系清王朝财政金融兴衰成败的要政、大政。

每年云南各府、州、县铜厂，完成额定的总计633.144万斤京铜，经由各地铜店集中，转运至东川铜店(东店)和寻甸铜店(寻店)，途经云南、四川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，然后转入运河，经山东，渡黄河进入河北，最后由天津进入通州，直抵北京。其间，途经今天的11个省(区、市)，贯穿大半个中国，水陆联运，跋涉万里，故称“关山万里运京铜”。滇铜京运以其运程遥远、道路艰险、运量巨大、运时漫长、动用人力物力庞大、运制完备、持续长久，影响深远，贡献巨大，创造了“今古奇观”，在云南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璀璨的篇章。

明代马龙象战

明代天启年间，马龙州(今曲靖市马龙区)发生了大象参加平定地方战乱的壮举，可算一桩旷世奇闻。

万历年间，奢安之乱横扫川黔，西南大地狼烟四起。天启五年(1625年)三月，土司安效良纠集水西、古蔺两股地方势力再掀战乱。五月，水西土酋军队数万人抵沾益、占曲靖，抢掠民众财物，一路烧杀到马龙。

面对严峻的战乱形势，时任云南巡抚闵洪学一面表奏朝廷，一面令布政使谢存仁、副总兵袁善、参将尹启易及本地土司等，率兵数千抵达马龙平定战乱。

初始，水西军人数众多，明军势单力薄，局势危急。在此关键时刻，景东傣族陶氏知府受命率精兵千人及训练有素的7头战象，日夜兼程赶到马龙，支援平定战乱。两军会师后，陶土司按照7头战象各自的体形，分别给它们披上铠甲，又在战象的两根长牙前端捆绑锋利的剑刃，剑刃能随象牙前后左右自如挥动。7头战象聚在一起，像一座环立的小山，阔步向前如土山滚动。

战斗开始，陶土司指挥气宇轩昂的大象走在各路军队的前面，迎战汹汹而来的水西军。象队作前锋，加之陶土司的上千精兵参战，明军士气大振。

双方在马龙南面的松子山至北面的轿子山一带约8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激烈厮杀。据《滇游记》及《滇黔游记》等史载：战斗开始时，大象按照周密制定的突袭策略，白天潜伏山涧，日暮月黑风高，7头大象以鼻吸泥水，卷成一团，突然发起攻击，咆哮跳跃，直抵水西军战垒鼻喷泥水，并卷入敌军阵营，其他人不知有如天降的是何庞然大物，因此惧怕而自相践踏。战象乘势分队奋勇向前，挺起矛一样的长牙，配合着利刃，威风凛凛冲向水西军阵地，真有撼山崩地、摧枯拉朽、所向无敌之势。水西军中有的被象鼻卷起抛向空中，有的被尖利的象牙和缠着的剑刃刺穿，有的被圆柱似的象腿踢翻、踩踏……

明军鼓角齐鸣，乘势冲锋，喊杀声震天动地，水西军慌不择路，溃不成军。此时，安效良咬牙切齿，下令发射毒箭。一头冲在最前面的战象中箭，剧烈疼痛使它怒性大发，在阵中横冲直撞，巨身所至，势不可挡……

经过五天的激烈厮杀，明军在轿子山的南面打败了进入马龙的水西军，全胜凯旋。再看这7头战象，其中一头战象，身上中毒箭密密麻麻，取下的毒箭有一箩筐，射入皮肉的毒液渗进了大象内体，年岁大象坚持了三天不幸毒发而亡。另6头大象，虽也不同程度中箭，但总算幸免于难。

马龙主政者告知全州各界，择黄道吉日，把阵亡的这头战象隆重下葬在马龙州城北面，令石匠刻石立碑，传诵其功。天启七年(1627年)，墓碑落成，碑正中题写“义勇全城忠烈神象之冢”，两侧碑文铭刻了战象的不朽功绩。

明代马龙人杜其渐，写了《义象传》，说这头身中毒箭仍然“争先陷阵，死无二志”的大象，就是著名勇士孟获、夏育也会“遇之其丧胆”，“熊虎当之亡其魂”。“论其威，则项羽之破釜也；论其烈，则赵云之战汉水也；论其功，则信陵之救邯郸也；论其死，则张巡之睢阳也。”杜其渐认为这头大象是正义的化身，其功绩足以流芳百世。

明崇祯四年(1631年)，到云南任巡抚的王光允经马龙，专程到义象墓地凭吊，感慨不已写下四首绝句，称“分明物亦凛王征，一代关怀九死争”，命令在象冢前建造牌坊，匾额题写“忠勇义象之坊”。进入清代，还有不少人前往拜谒义象墓，写下了《义象歌》《象冢铭》《马龙州义象冢》等诗文。

如今，明末建成的义象冢及牌坊已经不存，但忠勇义象的故事和精神，仍在马龙大地传颂。

(作者单位：马龙区委农办、农业农村局)

【滇铜主饶】

朝廷在昆明设立官营铜店

清代沿袭明制，在京城的工部和户部分别设立宝源局和宝泉局，并在各省设立铸局。清顺治元年(1644年)开始鼓铸“顺治通宝”铜钱。清前期的几代皇帝吸取元、明因开矿引起动乱的教训，一般都严厉禁止开矿。随着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迅猛发展，人口的迅速增加，货币需求量随之剧增。因此，解决日益剧增的铸币所需的铜料，成为关系财政金融稳定而亟待解决的大事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海禁开放，中国铸币用铜就几乎全部从日本进口。但好景不长，康熙五十四年(1715年)，日本德川幕府开始实行“锁国”政策，严禁船只出港，包括铜矿在内的各种矿产资源也严禁出口，清政府铸造钱币所需之铜只得转而依赖国内矿山。

云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，其中铜矿储量丰富，“滇多矿而铜为巨擘”(吴其浚《滇南矿厂图略》)，开采历史尤久远，早在3200年前的商代晚期就已进行开采和冶炼，至明嘉靖年间所铸“嘉靖通宝”钱币则宣告滇铜铸币历史的开始。清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，云贵总督蔡毓荣上奏《筹滇十疏》，提出以滇铜之丰饶，应“鼓铸宜广也”“矿研宜开也”的理财之策，建议大力增设铜厂，广泛开采铜矿，得到

运输过程包括三个阶段

【自滇至京】

朝廷采纳。康熙四十四年(1705年)，朝廷在昆明设立官营铜店，为各省采购京铜创造了条件，初步形成了云南铜矿业采、供、购一条龙的体系。与此同时，从康熙三十八年(1699年)到雍正八年(1730年)，长达31年在东川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，极大地推动了东川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，东川铜矿业进一步兴旺发展。雍正四年(1726年)，东川由四川划归云南，同时增开汤丹等厂，铜厂大旺。一向注重矿山建设与开采的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朝廷：滇省增开汤丹等厂以来，铜产量大幅增加，除了本省使用，每年有余铜200多万吨，官方无力采买，建议朝廷动用盐税余款收铜，再“转运至江南等省，令收买还项”。这一奏疏得到朝廷批准：“将滇省余铜，令该督督盐务银六万两收买，委员以一百余万斤运至汉口，以备湖北、湖南采办之用；以一百余万斤运至镇江，以备江苏采办之用。”雍正五年(1727年)，东川所产之铜外运汉口、镇江，然后转运北京，标志着滇铜京运正式开始。

乾隆三年(1738年)，朝廷全面停止采办日本洋铜，更大规模的滇铜京运随即拉开序幕。

半程又改为陆路为主。

铜运改程后，铜料仍在象鼻岭集结，由马帮装驮，过小江，沿大湾子爬高家坪经云峰进娜姑达白雾，再由白雾至东川府城(今会泽县城)。乾隆五十二年(1787年)，巧家富绅刘汉鼎捐资修筑蒙姑坡石匠房铜运古道，古道起自小江口，终点为东川府城(今会泽县城)。乾隆五十六年(1791年)道成，“较旧近二十余里”，此后，铜运马帮和民间往来均改行此道。京铜运至东川府城(今会泽县城)办理通关文牒后，即由会泽北上昭通，经大关、盐津豆沙关直达泸州总店。至今，会泽县娜姑境内仍留有两段保存完好的铜运古道，一段为蒙姑坡石匠房铜运古道，另一段为云峰铜运古道，均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滇铜运到泸州后，陆运基本结束，开始水运。运铜船队从泸州起航，至扬州仪征市大运河口起驳，大船满载京铜扬帆北上，在通州上岸，到京城户部和工部交货。至此，一次完整的滇铜京运始告完成。通常情况下，东川府每年运铜4次，从泸州至北京水运路段，每次有8支船队，每支船队13艘大船，每艘大船运铜6万余斤。陆运则需马匹9000余匹次。每起京运的期限，大约为一年，交铜后，从京城返回云南的时间限定为99天，延误或超期都将受到相应的严厉处罚。据《云南铜政考》一书统计，滇铜京运陆路2200余里，水路8200余里，全长万里之上。

为清王朝财政金融作出巨大贡献

【影响深远】

清代东川乃至云南全省，铜矿生产占据了全国十分重要的位置，仅以乾隆、嘉庆时期来看，“云南作为全国的铜原料供应地，铜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5%”。滇铜京运保证了清廷铸币所需大量原料——铜料的供应，为支撑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固提供了有力保障，作出重大贡献。《清高宗实录》载：云贵总督爱必达奏称：“其汤丹、大碌等各厂二十四五年两，办铜二千六百余万两，共得课息银五十余万两。”随着滇铜京运的进行，清政府每年向东川府所征税银由300余两增加为50余万两甚至到乾隆中期的100万两，其增长之迅猛，对国家财政贡献之大，可见一斑。

滇铜京运对云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滇铜京运将云南与中央乃至全国紧密联系在一起，云南在为稳固和促进清王朝财政金融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也得以飞速发展，出现了“远人蕃利纷沓至，运釐茂安并自。顿令空谷成市廛，铃驮骈阗车轂走”的空前繁盛景象。

政治影响。由滇铜京运带动形成的农矿并举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，催生了一些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，尤以享有“万里京运第一城”美誉的东川府(今会泽县)为显著。兴旺的矿业和滇铜京运，推动了东川府由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，转变为农矿

并举的经济模式，经济社会长足发展。经济影响。滇铜京运直接促进了云南地区采铜、冶炼、鼓铸、加工等铜矿业的迅猛发展，进而推动了云南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城镇的繁荣鼎盛。仅以东川府来看，年平均铜产量达800万至900万斤，最高产量为1400万斤。从铜厂人數来看，汤丹厂“民曾达10多万人”。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高度聚集，使得矿区成为一个需要大量聚集粮食、燃料、生产和生活物资的区域。

文化影响。滇铜京运带来云南铜矿业的迅猛发展，引发了清代的移民浪潮，陕西、甘肃、安徽、江西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广等10余个省份的富商大贾、贩夫走卒、矿工、工匠、民夫、文武官员云集于云南。云贵总督张允随曾于乾隆七年(1742年)和乾隆十一年(1746年)先后奏称：“外省游民流入滇境者不下数十万，皆赖开矿走厂度日。”“滇省……惟地产五金，不但滇民以为生计，即江、广、黔各省民人，亦多来滇开采。”滇铜京运带来多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，构建起了云南多元和谐的文化格局。如今，素有“万里京运第一站”美誉的会泽白雾村尚存的会馆、文庙、清代四合院以及四合五天井、走马转角楼、三坊一照壁等诸多建筑样式，就是滇铜京运所带来的多元文化交流、交融、和谐共存的历史见证。

如今，明末建成的义象冢及牌坊已经不存，但忠勇义象的故事和精神，仍在马龙大地传颂。

刘鸿燕(作者单位：云南省社科院历史、文献研究所)